

张爱玲

罗玛 著



凝视

THEY SEE THEM 凝视 他们凝视到出些什么样的东西

6=75

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凝视张爱玲

罗玛 著

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· 桂林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凝视张爱玲/罗玛著. —桂林: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
2004.4

ISBN 7-5633-4350-4

I.凝… II.罗… III.张爱玲(1920~1995) —
人物研究 IV.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121355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:541004)
网址:www.bbtpress.com

出版人:萧启明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发行热线:010-64284815

北京北关闸印刷厂印刷

(北京市通州区北关闸管理所院内 邮政编码:101100)

开本:889mm×1194mm 1/32

印张:6 字数:80 千字

2004 年 4 月第 1 版 2004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:8 001~11 000 定价:19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序

朱朱

她写着写着，就会忍不住与我谈起张爱玲，就像一个女人长期和另一个女人过从甚密，忍不住要向自己的丈夫或情人泄露些什么。

在张爱玲的经历里面，确有一些令人震惊的东西，她对此已经如数家珍，其中最让我难忘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晚年的张爱玲深受皮肤病的困扰，产生了到处是蚤子的幻觉，为此而不断地搬迁，只要我们想到张爱玲曾经写下的一句话——“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，爬满了蚤子”，就无法不因此而思考命运。正是从对一个生命进行感知的角度，我的妻子试图做出一些分析与还原；她在绘制这幅张爱玲肖像的过程里，诚实地“只画出领会的部分”。

读者们的情感往往倾向于一种艺术家本人的不幸，他（她）的伤痛、放纵、流亡、猝死与自杀等等（我怀疑至少有过那么一部分艺术家接受了暗示，按这样的“阅读期待”毁灭了自我）。我的妻子与此类不良癖好绝缘，对细节的深入接触使她如坠冰窖，甚至有些厌恶张爱玲，因为从这位晚年得以被加冕的女性那里，她觉察不出生命的暖色——有一天她说了很多张爱玲的坏话，最后做了一个假释：“如果张爱玲是我们的一个朋友，经常地待在一起，我肯定一点也受不了她。”随着写作的推进，她

的理解在逐渐加深，到了后来，她关于张爱玲的一些谈论，在我听来已经进入对人性的真正思考，张爱玲的各个局部不再被一味地放大，而是整体性地成为了一个被凝视的对象。

我认真地倾听着她的见解，并且从她那里获得了自己未曾发现的东西。有时候她的谈论确实可以用“精彩”来形容，当她的声音低弱下去的时候，我忍不住会说：“将你刚才说过的这些记下来，这会是一本好书。”这是因为当我翻阅她的稿件时，多少发现她进入字面世界后存在的一些犹豫，她有意要求自己变得更为周密，由此带来了某种损失。在那段日子里，家中几乎到处都有张爱玲的肖像、文字、痕迹以及气息，其作品集总是翻开在某一页上。在她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，我竟然也不觉地将张爱玲的那些作品全部重读了一遍。

法国诗人瓦雷里在《司汤达》一文结尾处写道：“关于司汤达的话，说不尽道不完。在我看来，这就是至高无上的褒奖。”这也合适于张爱玲。在当今的倾向中，批评家注重对其文本的研究，追溯现代文学发展的脉络；文化史学者们借助她的文学语汇切入年代氛围，复活一座消逝的世界；读者们往往流连于她的文字之美，混合着对她的身世、经历和仪态的爱慕和猜想，在一定程度上，将她刻意贵族化了。而对于这位孤高、文字与处世都含有某种极致调式的先辈，其后的作家们或者受益良多，或者作了一些特质的继承，或者自觉报以回避的态度，或者显示出轻视和调侃——所有这些现象都可以视为自然，一个生命

消散之后的自然：沙滩注定要受不同海潮的解释。

这本小书完成后，有一天，妻子述及她最深的感触，是“因为写了这本书而与张爱玲和解了”。

2004 年春

目 录

引言	1
一 最后的张爱玲	5
二 张爱玲的上海	15
三 童年	25
四 教会学校	49
五 爱丁顿公寓和姑姑	61
六 香港的日夜及其他	67
七 流言与传奇	81
八 传奇中的传奇	131
胡兰成眼中的张爱玲——《今生今世》片断	145
九 告别大陆	147
十 美国没有神话	157
附录 张爱玲年表	179

引言

让我们从最后的时刻说起。

那是1995年的9月，美国洛杉矶10911 Rochester Ave.公寓206室里挪动着—个瘦削的背影，这背影由于岁月的磨蚀略显佝偻，我甚至看得见她手背上青色的血管由于用力而略微地突起。她艰难地移动步伐，艰难地弯腰，将纸袋在门边放好。电话就在近旁，只要拨出号码，救助的人就会赶来。但她显然没有这个打算。

她走向那张后来被一再描述的行军床，无力再往窗外多看一眼，便缓缓倒下。

这之后她是否起来过无人知晓，房东发现她时据说已是数天以后。房间里一切如旧，日光灯依然亮着，这使得进门的人一眼就能看见门边的纸袋，那里边的身份证、遗嘱以及其他的证件，有助于尸体的确认和后事的处理。

这就是张爱玲，这是她留给我们的最后一个背影。就是这个背影，迫使我们面对生命的本质，迫使我们—再地追问，是什么使得一个女人如此冷静地面对死亡，并加以预先的操持？

回看张爱玲任何时期的影像，我们会发现她的面庞上始终有一种令人不适的表情，这表情矜持、生涩，即便在笑着的时候，也会流露出一不易察觉的冷意。这或许和她的骨骼结构有关，她的颧骨略高，人中略长，略微前倾的牙齿使她羞于开启笑口。这是一副拒人千里却又迟疑伤感的表情，这表情—直持续到她

独自倒下的那一刻。

张爱玲的死对于任何人都是一种刺痛，人们无法忍受一个备受追崇的女人如此凄凉地结束自己的一生。事后的种种追忆一再地表明，这样的结局本不该发生，她本可以得到更加周全的照顾，至少，可以在医院或其他任何能够得到临终关怀的地方体面地死去，而不是在那张狭窄的行军床上。

1980年之后的张爱玲，有多少人在仰望她，多少人追寻着她的踪迹，只为证实一个遥远的传说，为了得到她的消息，有人甚至不惜斯文扫地去翻看她的垃圾……可为什么她偏要如此决绝地选择独自上路？如此决绝地将世人的好意弃之一边？为什么宁愿静静地等死，也不愿和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再有丝毫的牵连？

正是在这样一再的追问下，我才猛然发觉——并非世界抛弃了她，而是她抛弃了整个世界！

张爱玲的死对我们而言意味着一种背叛，意味着一种自我的放逐与誓不和解的冷蔑与绝望。我想像着她冷静地准备遗物，冷静地将身体摆放停当并感受灵魂与肉体的分离；我想像着她的手脚在变冷，意识在绝对的孤寂中渐渐涣散；我想像着这一切早在她的想像之中……我相信，只有我知道，她一直在等待着这一天。

试图证明这一点并不困难，只要对她的遗物略加分析便会发现，一匹了无牵挂的死亡之马早在数年之前就已整装待发：在最后的那些年里，她大量地使用一次性的碗碟、刀叉，以一次性的拖鞋代替所有的鞋子，以纸巾代替日用的毛巾，任何能

够当场了断的事情决不拖欠到下次。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子，没有家具，甚至写字桌也以纸盒替代，她是洛杉矶少有的不使用私家车的人，除了电视机可以重复使用以外，其他的一切都可随手丢弃，包括那张行军床。她不接电话，不拆来历不明的信件，不见任何试图将她带回现实纷争的人，以一种完全的临界状态，等待最后的日子到来。

对于一个孤独的老人而言，这一天是否等待得太久？而事实上这孤苦之旅从她离开大陆的那天就已经开始，并且从此以后再无转还。

回溯张爱玲的一生是一件令人伤感的事，她的传奇早在1950年代就已结束，天才的星光也随着她漂泊的步履渐远渐淡。在后来的日子里，我们更多看到的，是一个知识女性在异国他乡的苦苦挣扎，而不是一个贵族后裔或天才作家的从容身影。她从未摆脱过经济的窘困，每况愈下的收入使她不得不以每一个字为单位，换算下一步的生存去向。那些曾经带给我们心灵震撼的文字，那些焕发着天才光辉并直指人性的文字，当它在生存的压力、文化的差异以及其他种种原因的逼迫下转换成房租、食物……一代才女的文学神话就此走向了它的末路。

而这末路比她的星光大道却要漫长得多。张爱玲在上海的巅峰时刻仅仅持续了两年，追溯到她有着望族背景的童年也不过二十多年，而这段日益黯淡的岁月却整整持续了四十年。这四十年的人生如果将它形容为一条河流，能够见诸文字并被我们所知晓的部分，不过是水面几道变形的反光，其他的每一分每一秒是如何度过的，只有她自己知道。

也许只有当我们真正地了解了张爱玲，才能真正地理解什么叫“传奇”——那只是人生的几个片段，几个与生活无关的华丽细节，就好像短暂的恋爱，或夸张的戏剧，只有最具张力的情节才有可能进入观众的视野。而那被省略的部分，那旷日持久的平常与琐碎，等待时日消磨的耐心与艰难，真正的人生，没有华采的乐章，只有传奇人物独自去品尝了。

张爱玲的海外生涯在公众的视野里留下了大片的空白，这不能不说是相互抛弃的一个结果。首先是我们抛弃了她，然后是她抛弃了我们。总是她抛弃得更彻底，就像她的小说，结束得干脆、无情，不留任何余地。

一 最后的张爱玲



张爱玲生前的最后一张照片，
摄于1994年。

1994年，有两件事值得提及。一件是台湾的《中国时报》向张爱玲颁发了终身成就特别奖，另一件是她的《对照记》由台湾皇冠文学出版公司出版。在这本书里她收录了从出生到定居美国六十多年间的五十多幅照片，附记简短的回忆性文字，行文十分悠缓，流露出归途在望的从容与释然。但这幅照片并不包括在内。

这是一张不祥的照片，在死亡的影射中引入了十分对立的意象，氛围诡异而尖锐。显然，她试图表达什么，但我并不认为这只是关于死亡的简单暗示。张爱玲是个刻薄的女人，她的略带讥诮的微笑告诉我们，这样的暗示另有趣味。

一年之后，也就是1995年9月，张爱玲在美国洛杉矶10911 Rochester Ave., #206, Los Angeles公寓悄然谢世，享年七十四岁。

关于张爱玲之死，当时的媒体有过种种报道。作为张爱玲在美国最亲近可靠的朋友和遗嘱执行人，林式同这样记述道：

1995年9月8日，中午12点多钟，我回家正想看当天还没看完的报纸，12点13分，张爱玲公寓的经理，租房时见过的那伊朗房东的女儿，突然打电话来说：“你是我知道的唯一认识张爱玲的人，所以我打电话给你，我想张爱玲已经去世了！”

张爱玲是躺在房间里唯一的一张靠墙的行军床上去世的，身下垫着一床蓝灰色的毯子，没有盖任何东西，头朝着房门，脸向外，眼和嘴都闭着，头发很短，手和腿都很自然地平放着。她的遗容很安详，只是出奇的瘦，保暖的日光灯在房东发现时还

亮着。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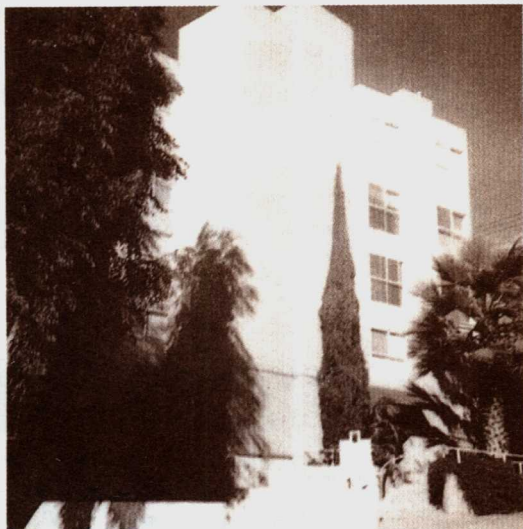
殡仪馆的人说看情形张爱玲已经去世三四天了……

据林式同回忆，1984年之后，张爱玲即因一个荒诞的理由在洛杉矶的各个汽车旅馆中不停地搬迁，有时一个星期就换一个地方——她认为她的公寓里总是爬满了蚤子。为此，她丢掉了所有能丢弃的东西，甚至剪掉了头发。这样的情形，一直持续到1988年找到治疗皮肤病的良方为止。居无定所的日子，不仅使她遗失了许多珍贵的手稿甚至身份证件，健康也受到了极大的损伤。

这让人想起十九岁时她在《天才梦》里说过的一句话：“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，爬满了蚤子。”

Rochester Ave. (罗契斯特街) 公寓外观。这也是张爱玲马不停蹄搬迁的最后一站。

晚年的张爱玲在洛杉矶过着深居简出、与世隔绝的生活。她极少见人，拒绝着一切外来的干扰，也从不“干扰”别人，这一点无疑秉承了她做人的一贯原则。胡兰成在他的《山河岁月》中曾经写道：“我在人情上、金钱上总是人欠欠人，爱玲却是两讫，凡事像刀截的分明，总不拖泥带水。她与她姑姑分房同



居，两人锱铢必较。她却也自己知道，还好意思对我说：‘我姑姑说我财迷。’”那时她二十三岁，所有的亲友中，姑姑是她最亲近和敬爱的人。

岁月的流逝显然并没能让她改变什么。事实上在后来的一再转述中，正是这种“人不欠我我不欠人”的处世姿态，为她平淡的晚年生活抹上了一层神秘色彩。

在这方面，曾经轰动一时的“垃圾事件”颇值一提。

自1961年夏志清在他的《中国现代小说史》中将《金锁记》誉为“中国从古代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”之后，张爱玲的声望在台湾开始回升，1970年代掀起的张爱玲热也是由台湾发起并迅速波及香港和大陆的。到了1980年代后期，能否得到张爱玲的消息已经成为决定报纸销量的重要指数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采访她的人前仆后继地涌向洛杉矶。然而，自1972年在旧金山接受水晶的采访之后，张爱玲便过起了隐居的生活。面对张爱玲的自我壁垒，媒体的精英们纷纷落马铩羽而归。只有一个叫戴文采的女人百折不挠，在采访的请求被断然拒绝之后，悄悄地搬到了张爱玲的隔壁，并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，用菩提树枝将这位邻居丢弃的垃圾勾到自己的房间。

对于这篇后来遭到一片斥责的“垃圾报告”，当时的知情人之一季季在他的回忆文章《我与张爱玲的垃圾》里这样写道：“现在回想整个事件的经过，我仍然非常为张爱玲感到悲哀。这件事不是一个单纯的‘张爱玲垃圾事件’，而是一件‘文化界的垃圾事件’！”

1988年，随着报禁的开放，台湾的媒体竞争进入十分激烈

的阶段。11月下旬，各大报社纷纷改版。作为某报的负责人，季季正是在这个时候从圣地亚哥被急召回台北。到任的第二天，就接到戴文采从洛杉矶打来的电话：“D小姐似乎很肯定我会等她那篇垃圾报道文学。她听我说已看完稿子，立刻提到报酬的问题：除了稿费要特案特办理，她住在张爱玲隔壁期间的一切押金、租金、电话等等费用，亦要我们另案附酬。”

尽管季季的回忆文字充满了厌恶，但我们知道，作为一名职业写手这位“D小姐”的要求并不过分。在这篇以“华丽缘”命名的文章里，D小姐十分明细地写道：“房租昂贵，一个月三百八十块，押金五百块，签约须半年，另扣清洁费五十，住不满半年押租不退。预定房间后，还得先缴银行户头信用检查费，上述诸款一概收现金或MONEY ORDER。”

这段文字一方面是在向读者报告张爱玲的经济状况，一方面也是在向用稿单位开出她的差旅清单。代价是昂贵的，近一千美元的付出，为的只是看一眼别人的垃圾！

“但这不是普通人的垃圾，这是张爱玲的垃圾啊！”在遭到报社的拒绝后，戴文采十分不解。她并不担心文章的发表，她担心的是别人对她的人格产生误解。在《华丽缘》里她解释道：“我在一次偶然的机缘里居然得到了张爱玲的地址，于是写了封十分八股但真实的信给她……张爱玲当然不见。……当即擅自主张另辟歪径。但因真正敬重，一开始即放弃‘暗算’，唯明目张胆搬入她的公寓，而且指定住她隔壁；也是天可怜见，等了十来天，真的等着她隔壁房间腾缺，为了以后可以光明正大，我在所有的资料上皆登记真名，如果张爱玲去问一声，必然水落

石出，虽然我深信她不可能问，但我也没有过欺她意图呀！”

尽管这样的解释颇有掩耳盗铃之嫌，但“D小姐”的专业精神也确实令人佩服，毕竟是她开创了采访史上前所未有的垃圾途径。不过读者们并不买她的账，即便是在迫不及待地读了她的文章之后也不买账。2002年，我在南京的半坡村咖啡馆偶遇台湾影星赵文瑄，他曾因出演《红玫瑰与白玫瑰》里的佟振保红遍大陆，时隔多年谈起垃圾事件，这个温文尔雅的男人仍然义愤填膺：“太可耻了，翻看别人的垃圾！这简直就是偷窥。”显然，在他的眼里，昔日的戴文采即是今日的狗仔队。

戴文采的报告也确实不比狗仔队高明。在文章中，她不仅详细地记述了张爱玲吃什么样的零食，喝什么牌子的牛奶，用什么花色的纸巾，读哪几份报纸，穿什么颜色的丝袜，抹什么样的药膏，每月水费多少，头发状况如何……甚至连她的购物清单也一一记录在案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垃圾采访远比狗仔队更具杀伤力。道理很简单，人们会躲避一个拿着相机满街跑的人，却不会提防一个拣垃圾的清洁工。

而戴文采远比狗仔队敬业，她一边联系着文章的发表，一边伺机进入张爱玲的房间。出乎意料的是，后者反应的速度比她还要快：在得知公寓里住进了“奸细”之后，张爱玲只用了一天的工夫便携全部家当连夜逃走了。

《华丽缘》借用的是张爱玲一篇散文的题目，从以下的片段文字里，我们可以看到一般人对张爱玲超常的崇拜：

她侧身脸朝内弯着腰整理几只该扔的纸袋子，门外已放了七八只，有许多翻开又叠过的旧报纸和牛奶空盒。她弯腰的姿